

19.4.8

高明文史

第七辑

高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一月

资料

目 录

濠基村的革命儿女·····	谭汉威 (1)
从“沙基惨案”到“广州起义”情况的回忆·····	区满孙 (41)
旅日侨领温昌华·····	罗培生 (44)
爱国爱乡的谭树钊·····	罗培生 (46)
旅越华侨刘秀记·····	罗培生 (47)
罗晓枫的生平事迹·····	罗培生 (49)
旅港高明同乡会简介·····	四 维 (52)
要明十三围水利工程修筑纪实·····	黄国东 (56)
高明水产养殖古今谈·····	黄国东 (60)
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旨与	
高明县的教育概况·····	黄之炯 (66)
高明的书院·····	黄之炯 (75)
东洲书院落成碑记·····	<u>黎荣才</u> (77)
高明海口“塔”·····	仇荣佳 (79)
飞来寺的历史·····	王晓恺 (83)

EA98/45

关于更楼“清平堡”	麦旭和 (8 4)
书院“白蚁”趣谈	麦旭和 (8 6)
宋名儒谭惟寅七岁能诗	麦旭和 (8 8)
轻功武侠和尚友的轶闻	麦旭和 (8 9)
麦锡良作文驱狼记	麦旭和 (9 3)
关于征集文史资料有关问题	
.....	政协高明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9 5)

濠基村的革命儿女

谭 汉 威

濠基村是高明县明城镇一条小村庄，它座落在沧江河（高明河）中游北岸，紧邻明城圩。这条小村，在艰苦的斗争年代里孕育出不少英雄好汉、志士仁人。他们在风风雨雨的革命历程中作出无私的奉献，其斗争史迹在高明县的革命历史记载中，有其光辉一页。为此，佛山市人民政府于1990年1月19日把濠基村定为抗日根据地村庄。

大革命时期的精英

濠基村只有百多人，但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先后参加革命斗争的就有20多人，这和革命前辈谭植棠、谭天度（明城七社村人）的思想教育、言行影响分不开的。谭植棠是谭超的长子嫡孙，由于3岁父亲病逝，由祖父和母亲抚养成人，乳名取“亚定”。所以村中人都称他“定哥”、“定叔”、“定伯父”。

植棠少时聪颖，其祖父苦心教养，希望他长大能操持家业。但植棠有其志向，拒不习商，十多岁便离家外出求学。时值辛亥革命爆发，在革命潮流推动和鼓舞下，跑到广州投考陆军小学，因体格问题没被录取，转而考入高等师范学校。

附中。中学毕业，又和其堂兄谭树棠一齐考上高等师范继续学习。这是植棠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1917年，新文化运动由北京、上海等地掀起，植棠受新文化思潮的鼓舞，又闻教育家蔡元培入长北京大学，心里渴望到“北大”学习。植棠和树棠商量好，让他投考“北大”。植棠联同“高师”一些同学北上，考进北京大学。植棠在北京的两年时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北大”，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知识，阅读新书刊，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更使他认识到：若想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推翻国内军阀，尤其必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一致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1920年3月，谭平山（明城七社村人）、谭植棠和陈公博（陈后蜕化为汉奸）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政衡》杂志（月刊），公开评论时政，权衡社会利弊。植棠在该刊先后发表了《中国历史政权中心转移之研究》、《关于我国承认新俄罗斯的商榷》、《和平主义最后的胜利》等政论文章。他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光明前景，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他认定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1920年夏天，谭植棠和谭平山及其同学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各种进步团体顺应历史潮流崛起，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深深感到，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积垢很深，暮气极重，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社会状况，非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领导国民起来奋斗不可。因此，植棠和平山等人共同发起，于8月在广州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可是由于

缺乏经验，团员成份复杂，宗旨不能统一，这个组织仅存在一段时间便停止活动了。10月，谭植棠、谭平山等为了唤起广大民众，改变目前之现状，决定创办《广东群报》。他们节衣缩食，私人集资，并请求自己的家庭 and 老同学、老朋友资助，终于在广州市第七甫一百号建立起“广东群报社”。自此，《广东群报》成为广东共产党诞生之前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广东共产党的建立作了舆论的准备，树起一面光明的旗帜。

《广东群报》出版，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明城七社人）即把它寄回高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东洲书院）；尔后，还连同《向导》、《青年周刊》等革命刊物不断寄回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这期间，谭植棠还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向乡亲们传播革命思想，并发动青年开展反对教会等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植棠的思想教育影响很大，村里成立了“同志堂”、“同乐社”等青年进步团体，进行移风易俗，毁灭神权的活动。当时乡里的“镇海宫”、“白业庵”里的华光大帝、十八罗汉等神像，通被扔到池塘。拆掉了庙堂，又成立青年会，把婚姻不自由，女子婚后10多年不落男家的陋习加以改造。天主教堂的教士来村说教时，村人便一赶二打，半句上帝也不准说。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政府的邀请从上海前来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次南下，他除了主持广东教育工作外，还负有组织华南共产党的任务。陈独秀在北大是文科学长，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是师生关系。当他了解到3人在广州领导的群众组织基础，提出要领导好民运，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谭植

棠等3人一致赞同。

1921年春天，共产党广东支部诞生了。当时，这个组织只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等9人。他们推选陈独秀担任支部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并决定把《广东群报》作为党组织的机关报，由谭植棠担任经理。中共广东支部建立后，谭植棠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他除了办好《广东群报》外，还积极参加创办“广东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干部。“宣传员养成所”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分甲乙两班，共一百多人。谭植棠担任教导主任兼甲班班主任，并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其时，高明有一批进步青年到该所学习。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会后，谭植棠坚决执行党的“三大”的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共广东党组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加速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1924年7月，以国民党名义在广州创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谭植棠被聘为教员，给农讲所主任、我党最早的农运领导人彭湃以大力协助。由于植棠富有革命责任心，治学精神严谨，所以第二、第三届时均被聘为教员。这三届农讲所共培养近三百名革命干部，谭植棠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我县进步青年麦均林、谭其聪、谭葵谦（女）参加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毕业后，谭葵谦留在谭平山身边工作，谭其聪到东莞县搞农运（1926年曾回高明活动）。

1925年春天，为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建立了主席团，负责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和南洋等地的工作。主席团由陈延年、张太雷、彭湃、苏兆征、邓中

夏、周恩来、邓颖超、谭植棠等组成，以陈延年为书记，谭植棠分工负责农民运动和统战工作。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急需大量的农运干部。因此，我党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五月继续开办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谭植棠为主任，聘请彭湃、恽代英、阮啸仙、唐澍、赵自选等担任教员。招收了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九十八名农运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入校学习。在农讲所开办期间，正值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为了支援工人的斗争，谭植棠特在农讲所内办了一期“罢工工人补习班”，为罢工运动培养了50多名干部。同年9月，第四届农讲所结束后，谭植棠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担任组织干事。他以农民部的名义，编制了各种表册，分发给各地的农运特派员，调查各地民团、土匪、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的情况，及时指导农运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同年10月，第二次东征时，谭植棠还偕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亲临东江前线，一方面慰问东征将士，一方面视察潮梅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

谭植棠不但一心扑在农民运动的工作上，而且身体力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原来植棠的祖父生前以经营酒米铺（裕丰号）和收取部分田租为生。祖父生有5子，祖父以下几代人都是分食不分家业的。此期间，他多次写信回家，建议把所有的田产都以低价卖出或送回佃户，不要靠收田租剥削农民。但由于掌权的堂兄弟的拖延而没有搞下去。植棠的堂兄谭树棠在广州用钱运动得出任新兴县县长，因此回家搞了一套上任的班子准备走马上任，县内也张贴了告示。树棠到了广州，突然接到通知上峰面谕说及：“只须征得你弟弟谭植棠的同意，不需代价便可上任。”植棠得知了，不但不

同意，还三番四复劝告树棠要坚持走教育道路，切不可做官。树棠接受了意见，不但没有去成，而且在教育界耕耘10多年，直至解放初逝世。

1926年1月，谭植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16日，谭植棠出席了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参加研究开办第六届农讲所的问题和开展全国农民运动的有关事宜。在我党的领导下，在彭湃、阮啸仙、谭植棠等的具体指导下，至同年四月，广东建立了66个县农民协会，会员达62万多人。

谭植棠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主席团之后，一方面参予领导广东农民运动，另一方面致力反帝斗争，做好统战工作。

1925年至1926年，谭植棠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反帝斗争。

省港罢工爆发后，谭植棠联络各界发起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作为开展统战工作和联系各阶层人民的阵地，也作为支援罢工、反帝斗争的一个行动机关。谭植棠担任该会主席。1925年7月24日，该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一律起来，准备武装”，“学生组织学生军，工人组织工团军，农民组织农民军”。不久，广东各地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纷纷起来，封锁了香港、沙面和广东沿海各港口，使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阴谋资助反动军阀陈炯明和邓本殷，勾结北洋军阀，妄图夹击广东革命政府，破坏罢工。在这紧要关头，谭植棠当机立断，亲自主持了广东对外协会第二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举行一次“统一广东

省示威大运动”。8月11日，他在广州第一公园主持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统一广东大示威运动大会”。在反帝反封建的热潮中，广东20多个群众团体成立了“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谭植棠被推选担任主席。他肩负广东人民的委托，努力扩大斗争成果，积极派出外交代表团，联络上海、汉口、九江等地民众，拟在北京组成一个全国对外代表团，发动全国人民向帝国主义进行更广泛的斗争。9月17日，他在广东大学礼堂主持了各界欢送外交代表团大会。

11月，谭植棠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秘书，协助部长杨毓安（共产党员）工作。在工作中，他同国民党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团结了大批国民党进步人士。如教育界的陈信明、黎勇壮，工商界的简琴石、梁培基等，就是在他的团结帮助下和我党密切合作，成为统一战线中的骨干。谭植棠由于长年累月的工作，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病，这在当时被视为是“不治之症”，对他是严重的打击。但植棠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在身患重病的日子，还先后参加了“列宁、李卜克内西纪念大会”、筹备“巴黎公社纪念会”、“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会”、“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会”等，担任了罢工委员会举办的劳动学院和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举办的“青年夏令讲学班”的教员，为革命培养干部。

1926年秋冬，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准备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在这转折时刻，谭植棠在18日主持召开了一次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广东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发起一个扩大反英的运动，以配合罢工策略的改变。他指出，我

们这次变更罢工政策，绝不是屈服！我们还要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运动，“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必须得到最后胜利为止。”他在对敌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曾被人们称为“反帝斗争的先锋战士”。

1926年底，谭植棠的肺病趋于严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有一天，他在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上讲演。他说：“为什么地主资本家不劳动却有那么多钱，那么多粮食，吃好穿好，而我们工人农民整天劳动都得不到温饱呢？这是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我们的结果。我们若不打倒地主资本家，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活下去……。”此时，有几个右派分子跳出来捣乱会场，引起轰动。谭植棠怒不可遏，当即揭穿他们的嘴脸。由于过于激动，引起大口吐血，当场昏倒。送到博济医院抢救才醒过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同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叛变，出动大批军警，解除黄埔军校、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和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和组织，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根据当时形势，组织上决定让谭植棠转院医治。在他转院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就追捕到博济医院，由于他已经转移，才未遭毒手。此时，国民党特务曾闯进植棠的住家（当时全家住在舍人坊），抄家搜查，搜出一条红布，上写着“广州总工会成立”，特务于是就拳打脚踢，把植棠的妻子罗亚女打倒在地上，口吐鲜血。由于敌人的暴行，使罗亚女受惊以至神经失常，还经常衄血，于1931年就逝世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又决定把植棠（化名谭天）转到东莞县石龙镇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诊治。但是，这时广东党组织已遭

到敌人严重破坏，无法派人对他料理，并且敌人通缉他的风声越来越紧。怎么办？只有通知乡间的家人接他回乡。他的三叔父谭仲珊知道情况危急，立即从家乡赶到石龙医院，把他接了出来，先转到澳门，然后雇上一只船，把他藏在舱底，秘密运回家乡。

植棠回到高明后，身体极度虚弱，每天吃的都是米汤和流质的东西，不能下床走动。在其母及其他亲人的细心护理下，直至1930年，身体才慢慢有所好转，但因久病体弱，无力担负艰辛的工作。这时，由于正是反革命高潮，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植棠从离开广州后，已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回乡间后，地方党的同志对他不认识，不了解，组组关系也就无法恢复，植棠只得深居简出。身体稍好一点，便和堂兄一起做些生意度活，一方面借以掩护身份，另一方面暗做群众工作。植棠虽然是“北大”的毕业生，却与那些吓人的地主士绅、资本家的秀才截然不同。他穿着简朴，毫无架子，对劳苦大众有深厚感情，使他能广泛接触很多工人农民，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他精神稍好时，便给予侄兄弟乡里讲革命故事和先烈的英勇事迹，讲俄国沙皇统治时人民生活的惨境，讲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胜利后的社会变革，使人民生活富裕，讲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指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由于植棠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很是吸引人，使家人和村里人，甚至附近的乡里，特别是青壮年都特意来听，并议论这些新鲜事物。家人和乡里群众从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懂得很多道理。谭植棠有坚强的革命信念，在广州期间，国民党曾以高官厚禄想把他拉过去。他断然谢绝（他曾对侄子汉杰说过国

民党如何许诺：如果植棠能过去帮他们做事，可拨上海半条街的产业和委以警察总监的职位。但他嗤之以鼻）。在困难时期，他也绝不改变志向。同村有一个乡里，原来侨居日本，曾回广州读书并入过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回了日本。以后这人曾回过家乡，并询问过植棠的健康近况，叫植棠找找过去的同学陈公博（已变节成汉奸）找事做。对于这件事，每当一谈起，植棠就拍着大腿非常气愤地说：“我回答他的是‘过去的定哥就是现在的定哥，现在的定哥也是过去的定哥，是绝不会改变的’。”由此可见，谭植棠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何等坚定，对自己走的革命道路充满信心。

谭毅夫，又名谭建勋，是濠基村谭谦的儿子。他是广东地区早期的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干部。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捕，后来英勇就义，年仅24岁。

1920年，谭毅夫正在高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东州书院）读书。此时，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把《广东群报》、《向导》、《青年周刊》等革命刊物寄回东洲书院，在家乡开展启蒙教育。毅夫反复阅读，从中受到教育，开阔了政治视野，萌发了追求进步的念头。毅夫积极参加了谭植棠在明城地区组织的“同志堂”、“同乐社”的活动，从中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参加了一些反帝反封建活动。1922年初，他同一批进步青年毅然离开家乡，到广州投考广东高等师范附属中学读书。高师是中山大学的前身，谭平山、谭植棠等中共党员曾在这里任教，并成立过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研究团体。因同乡关系，毅夫经常和谭植棠他们接触，学习革命理论，思想进步很快。

1923年6月，毅夫参加了“新学生社”，正式投身革命活动。不久，便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毅夫参加组织后，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喜欢音乐，特别是管乐，每当节日或配合各个运动的宣传，他都以其特有的急才，结合实际，自编、自奏、自演节目，吸引大批观众，使政治宣传收到预期的效果。当时，广州有大批失学失业青年。团组织通过新学生社，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名义，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举办平民教育，设立了数十个教场，由新学生社社员和青年、团员任教。毅夫积极参加教学工作。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毅夫遵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积极投身国民革命。他是附中分部成员，通过分部活动去团结中间同学，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认识，积极加入到反基督教大同盟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中去。当年，英帝国主义通过办学校，设教堂进行文化侵略，麻痹青年和工农大众的思想，以成为他们的奴隶。为此，毅夫经常在礼拜堂门口宣传反基督教的意义，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当时，有一间“圣三一”神学院，不准学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还持枪把守在学院门口。毅夫知道后，便和周文雍等发表宣言，在街上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本性。后来，该学院大部分学生思想觉悟了，冲出了校门。毅夫还代表附中前往慰问，支持张元恺老师带领同学另建学校。他的行动受到党团组织的称赞。同年底，毅夫经受各种斗争的考验后，由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初，毅夫奉命在广州白鹅潭两岸的均和安、协同和等机器厂以及铜铁工人聚居的光复路打铜街一带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青工学徒中，了解到资本家对他们的深重

剥削，但工人敢怒不敢言。毅夫把他们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开展改善待遇、减少工时的斗争。广州打铜工人，大部分是在资本家办的手工业店铺中生产杂件和生活器皿。商团军叛乱，不少店铺被烧毁，工人失业。毅夫支持铜铁工人与老板签订劳资两利、恢复生产的协约。经过毅夫的努力，工人们组组起来成立了铜铁工会，这个工会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广州有4千多洋务工人。自1924年8月在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下取得沙面洋务罢工胜利后，周文雍又在青年工人中建立了“青年工社”，在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文员公会、惠群公社和西厨工会等组织还是带行会性质，其领导人实质是工头，公社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为此，党又派毅夫到洋务工人中进行统一工会的工作。他在中共洋务工会支部书记谢汝崧的具体帮助下，深入清平街、洗基一带洋务工人聚居的地方开展工作。有位回族工人马四，是个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徒，人人尊称他为马四爹。毅夫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四爹一家人拥护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支持子弟马技等10多人参加党团组织，在省港罢工和统一工会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在广州起义中作出了贡献。

1926年初，谭毅夫等随谭天度到石井兵工厂开展工作。石井兵工厂是广州唯一生产军火武器的大厂，有产业工人2千多名，是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右派斗争、红色工人与工贼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谭天度当时任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厂训育部主任，毅夫等任训育员。他们依靠兵工厂的中共党员和社会青年团员，首先组织和办好红色工会。除了分头到各车间和青年交朋友，还通过恢复工人文化夜校广泛

接触工人，了解到工贼和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及时在适当场合揭露他们的阴谋，为维护革命团结，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谭毅夫在从事工运期间，由于工作出色，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工运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以后，蒋介石逐步篡夺党政军大权，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当时，国民政府在全省的工农群众支持下，已经统一了广东，而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支持了各地右派势力和土豪劣绅争夺国民党党部实权的活动。他们勾结起来打击工农运动，阻挠革命形势发展。为加速改组各县党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中共党员杨匏安与左派人士团结一致，决定从工农战线中选一批双重党籍的党员和左派人士为党务特派员，到各县改组国民党，重新筹备各县党部的建立。谭毅夫同陈殿钊被派往三水县，任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员，负责改组工作。他依靠工农群众和左派人士，改组了国民党旧党部，重新组成了以工农骨干为核心的新的国民党县党部，发展大批工农分子加入国民党，改变了三水县国民党组织的结构成份，为斗争打开了局面。其间，毅夫还领导三水碾谷工会开展过罢工斗争。

同年冬，毅夫奉命调回广州任广州手车夫工会党团书记。手车夫工会是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会员工会之一，有1万多会员，建有7个分会和党团组织，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此时，国民党右派已磨刀霍霍，准备向革命群众开刀。为加强手车夫工人的战斗力，毅夫与工会其他领导团结战斗，训练了一支以青年工人为骨干的武装队伍，粉碎了反动工会和工贼制造的一次又一次分裂和流血事件。

1927年4月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毅夫和沈青、手车夫骨干王田等分别到各分会和支部召开应变会议，传达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精神，部署应变工作。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派继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也背叛革命了。反动派的军警包围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等共产党机关和进步团体，拘捕和杀害了中共党团员、革命群众2千多人。当日凌晨，毅夫发现反动军警纷纷出动，深知情况不妙，忙把党和工会的文件烧毁。接着又冒着危险去通知骨干转移，并转回越秀南路平民教育会住处，和香港学联会的黄锦涛等一起，迅速烧毁文件。正当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住处已被反动派包围，毅夫和同志们被捕了，押在南关戏院。过了几天，毅夫被叛徒冯金出卖，押上囚车，解往南石头惩戒场监狱。谭毅夫、彭粤生、黄锦涛等被囚禁在一个牢房里。

小小牢房，也是一个社会阶级斗争的缩影。这里龙蛇混杂，在刑罚和生死面前，有人心灰意冷，对革命失去信心；有人在狱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示和共产党划清界线；有人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求全，甚至叛党投敌。而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的谭毅夫，则利用放风的几分钟时间，秘密与群众联系，开展地下斗争。当时，监狱生活条件非常差，给“犯人”吃的是渗沙石的粗饭和发霉的烂菜。黄埔军校六期生组织的地下支部发起绝食斗争，谭毅夫、彭粤生立即响应，并发动全监狱的犯人都参加绝食。监狱长害怕暴露自己贪污伙食费的罪行，便下令给犯人改善伙食。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接着又领导了争取延长放风时间的斗争。

同年11月，粤桂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爆发战争，中共广州党组织立即抓紧时机，组织探望狱中同志，取得了秘密